

The Archeological Study on Jiuzhouchi of Luoya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宋洛阳宫城御苑九洲池初探

韩建华 Han Jianhu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内容提要:

九洲池是隋唐宋洛阳宫城内一处重要的池苑建筑, 荟萃了唐宋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 可谓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杰出典范。本文根据考古资料, 对九洲池遗址进行考古分期, 对不同时期九洲池的形状规模、池岸结构、池底结构、池中岛屿及建筑等园林要素进行归纳。分析九洲池的宫苑布局特点: “广水无山”, 平地筑园; 多岛屿, 九洲池中发现十多处大小不同的岛屿, 中国古典园林的“一池三山”的传统依然存在, 但并不拘泥于“三”这个数目; 园林建筑形式多样, 既有长廊建筑, 又有亭类建筑, 还有殿阁建筑; 巧妙应用“尺度设计”; 生物配置范围广泛, 品种丰富。“园囿之废兴, 洛阳盛衰之候也”, 九洲池始建于隋代, 得益于汉魏时期引谷工程而形成的小面积水域, 唐代扩大面积, 成为政治舞台, 宋代九洲池面积变小, 随着北宋西京政治地位的衰落, 皇家的九洲池也随之衰落、废弃。

关键词:

唐宋 洛阳宫城 九洲池 御苑 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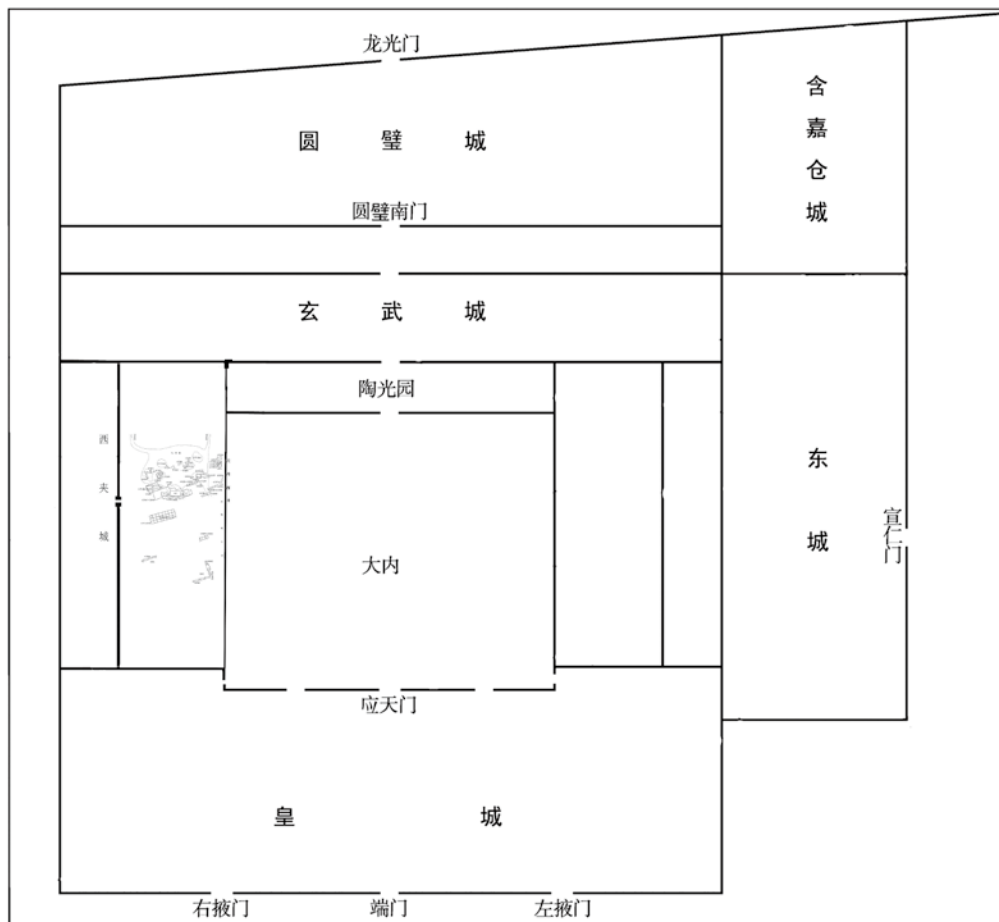
Abstract: Jiuzhouchi (九洲池, literally “The Pool with Nine Islets”) is an important garden of Luoyang in the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he Tang and Song gardens' architecture art and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 gardens. By referring to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Jiuzhouchi site into several archaeological stages and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times. The current author analyzes the elaborate layout of the garden in terms of its pools, islets, hills, corridors, pavilions, temples and even animals and plants. The situation of the imperial garden is usual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ontext. Jiuzhouchi was at first built in the Sui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a small area of water formed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n was enlarged and bloom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at last declined with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imperial palace of Luoyang; Jiuzhouchi; imperial garden; archeological staging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变革时期，园林的发展同样处于重要转型期，从隋唐的全盛期进入宋代的成熟期。特别是作为皇权象征的皇家园林，其变化更能充分反映这种变革，园林从选址、用地规模、布局意境、园林要素等方面，处于承上启下的变革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皇家园林的变迁过程，有助于理解和深化唐宋变革，把握中国社会的变迁对古代园林发展的影响。

从南北朝以来，皇家园林的划分趋向细化，其中宫城御苑的出现，是皇家园林成熟的重要标志。宫城御苑，一般位于宫城内，紧邻宫廷区，呈宫、苑分置的格局。隋唐时期宫城御苑采取“广水无山”的空间模式，把水面作为景观主体，创造以平视为主的空间意象，展现恢宏的气概和灿烂的光彩。此时期御苑规模空前，布局整齐，且多以庭院的形式布局，突显“圣王境界”。宋代随着开明的封建政治和宽容的文化政策的推行，御苑的皇家气派相对减弱，用地规模减小，园林的诗画风格和方池圆沼的布局意境等，都深深地烙上简远、雅致的文人园林的风格，同时也有精致悠闲的宫廷生活特点。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跨洛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宫城、皇城位于都城西北隅的高冈之上，并于宫城内修建九洲池，引谷水入城，形成宫城御苑。唐宋两朝均沿用隋东都洛阳城，继续作为都城，或东都或西京，历时五百年之久。九洲池也从隋沿用至唐宋。九洲池位于宫城的西隅城内(图一)，其修建、使用及废弃的过程与隋唐至宋洛阳城的兴废同步，当然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关联。《洛阳名园记》载：“园圃之废兴，



图一 隋唐时期九洲池的位置

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1]九洲池的兴废，也是洛阳城盛衰的反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利用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现，对九洲池进行考古分期，对不同时期九洲池的形状规模，池岸、池底结构，池中岛屿及建筑等园林要素进行归纳，同时总结九洲池给排水系统的特点，分析九洲池的宫苑布局特点。

一 文献中的九洲池

历史文献是今人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记录、考订隋唐洛阳城的文献始于隋，隋代有宇文恺的《东都图记》和诸葛颖的《洛阳古今记》等；唐代有杜宝的《大业杂记》、邓世隆的《东都记》、韦机的《东都记》和韦述的《两京新记》等；宋代有宋敏求的《河南志》；清代有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等。这些文献记载，记述东都洛阳近域的山川形势、聚邑乡里、道路关隘，以及城内的宫殿、衙署、寺观、宅第、巷陌等，是研究东都洛阳城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关系的基础资料。作为隋唐至宋洛阳城宫城御苑的九洲池，是文献记载所不可或缺的，梳理这些文献，是研究和认识九洲池的起点。

唐代丽正殿直学士韦述在开元十年（722年）撰写的《两京新记》中，对九洲池的地望、形状和规模作了简要概述，是探讨九洲池最有价值的文献。韦述是司农卿韦弘机曾孙，唐玄宗时代的史官，居史职二十多年，嗜学著书。唐开元十年所撰的五卷本《两京新记》，是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述。撰写此书时，“两京已创建百有余年，都市的整体规划也大致定型，其内部建置与社会也经历了兴立迁转，城内宫殿、坊市、第宅、寺观、人物与景观达到最为饱和的状态”^[3]。据日本福山敏男推测，其中卷四为东都总说及宫城、皇城、东城及诸坊，卷五为诸坊^[4]。韦述所记之事或来自秘府珍籍，或属耳闻目睹，是研究唐代两京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遗憾的是这部书在中国早已散佚，所幸《两京新记》唐末传入日本后，以写本形式保留下来。自从日本天瀑山人在《佚存丛书》中刊布此残写本《两京新记》以来，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学者，都利用这份珍贵的资料，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辛德勇先生依据中日两国学者的辑校本，重新辑校《两京新记》，其中尚有关于九洲池的记载。

唐代韦述撰《两京新记》“东都宫城”条记载：“九洲池在仁智殿之南，归义门之西。其池屈曲，象东海之九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鸟鱼翔泳，花卉罗植。”^[5]

宋代著名地理学家宋敏求于北宋皇祐、熙宁年间，在《两京新记》的基础上增删改订，撰写成《河南志》，是今天能够见到比较系统的有关东都洛阳的资料。“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靡不备载考之。”^[6]其中记述了九洲池及其周边建筑景观的昔时风貌。

《河南志》卷三《隋城阙古迹》：“九洲池。其地屈曲，象东海之九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中有瑶光殿。琉璃亭。在九洲池南。一柱观。在琉璃亭南。”书末附《隋都城图》，图上标注有九洲池的位置，九洲池的形状用黑色表示，呈不规则形（图二）^[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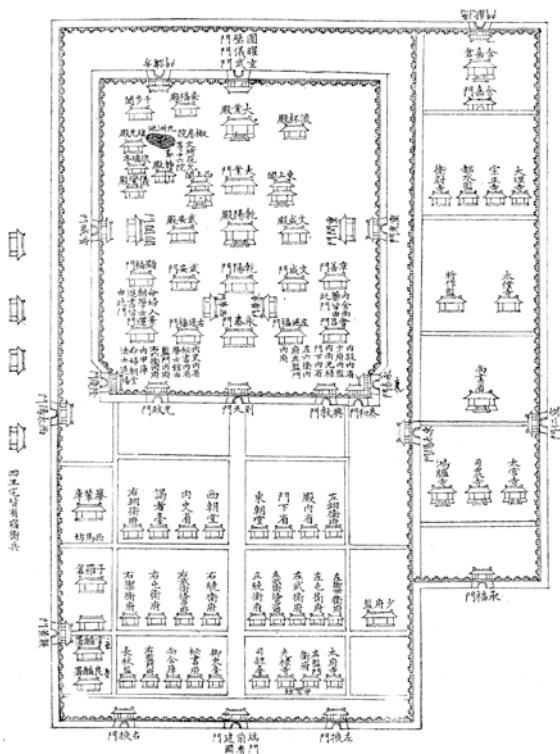
《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九洲池。在仁智殿之南，归义门之西。其地屈曲，象东海之九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鸟鱼翔泳，花卉罗植。瑶光殿。在池中洲上。隋造。

琉璃亭。在瑶光殿南。隋造。望景台。在九洲池北，高四十尺，方二十五步，大帝造。一柱观。在琉璃亭南。隋造。”书末附《唐东都城图》，图上标注有九洲池的位置，唐代九洲池呈南北向的圆角方形，面积比隋代扩大，并用文字标出瑶光殿和琉璃亭（图三）^[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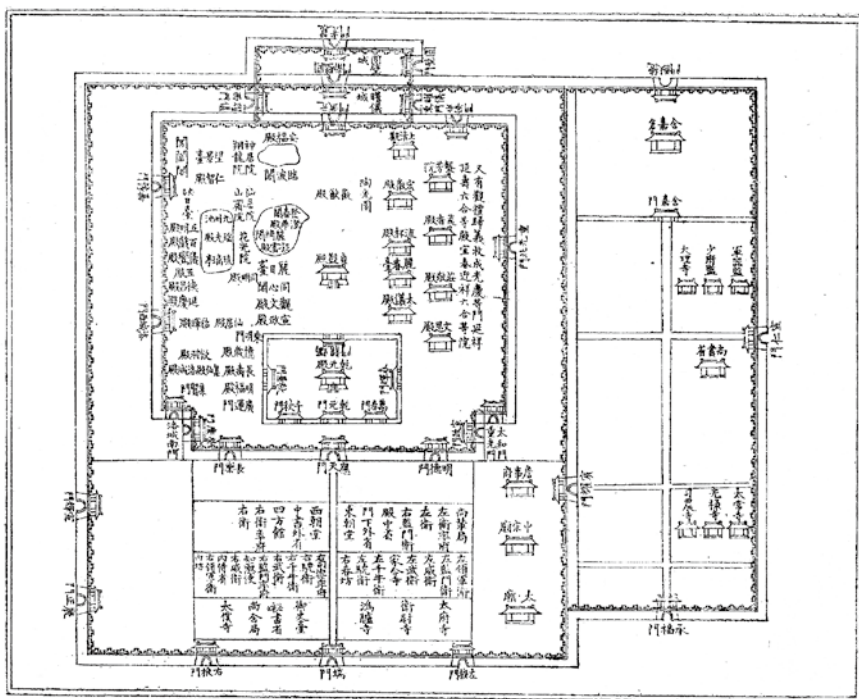
《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九江池，一名九曲池。梁太祖沈杀九王之处。……其南有内园门。”书末附《宋西京城图》，图上文字标注“九曲池”，在文字标注“内园门”位置之北，未标注池的大小（图四）^[9]。

徐松广泛搜集资料，编撰了《唐两京城坊考》，“堪称此前研究之集大成之作”^[10]。该书征引有关文献对唐东都，包括九洲池作了详细的考证，取得了许多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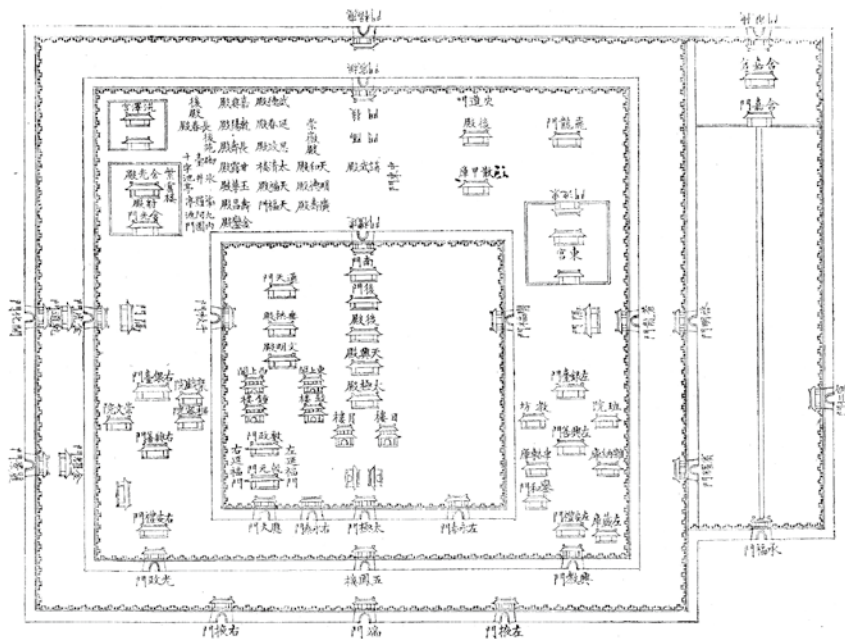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宫城》记载，九洲池“在仁智殿南、归义门西，其池屈曲，象东海之九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鸟鱼翔泳，花卉罗植。池之洲，殿曰瑶光，隋造。……亭曰琉璃，隋造，在瑶光殿南。观曰一柱，隋造，在琉璃亭南。环池者曰花光院、曰山斋院，在池东。曰



图二 《河南志·隋都城图》中九洲池的位置及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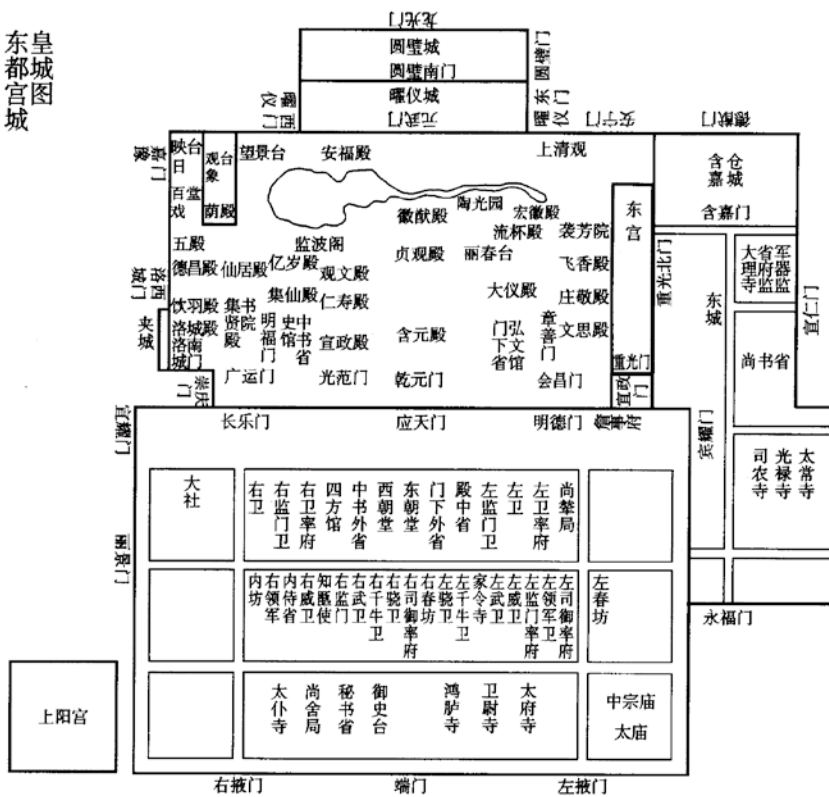


图三 《河南志·唐东都城图》中九洲池的位置及形状



图四 《河南志·宋西京城图》中九洲池的位置

东都城官城



图五 《唐两京城坊考·东都官皇城图》中九洲池的位置及形状

翔龙院，在花光院北。曰神居院，在翔龙院北。曰仙居院，在安福殿西。曰仁智院，在仙居院西。殿西有千步阁，隋炀帝造。南有归义门。曰望景台，在池北，高四十尺，方二十五步，大帝造。”附《东都宫皇城图》，图中绘有九洲池，其形状呈倒置的葫芦形，向东与陶光园相连（图五）^[1]。

南宋王应麟等纂《玉海》中论及九洲池，与《两京新记》记载相同^[12]。

根据以上的文献记载，可知九洲池的大概情况：位于隋唐东都洛阳宫城的西北部，是隋炀帝规划、兴建东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九洲池中的瑶光殿、琉璃亭、一柱观皆隋代所建。“居地十顷”的规模如何？查阅文献，唐代对于“顷”有明文规定：“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13]一亩为二百四十步，这里的步应该指方步，是面积的单位。以唐代一步五尺，一尺按29.5厘米的唐大尺计算，一亩为522.15平方米。百亩为52215平方米，十顷就是522150平方米。

九洲池作为宫城御苑，主要是供皇帝、妃嫔、公主、皇子等居住、宴游的御园。为满足不同的需求，历朝在九洲池及周边修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群，这些建筑不仅扩展了九洲池的空间，也增添了游玩赏乐的趣味。根据文献所载，九洲池上及周边的建筑类型有：院（花光院、山斋院、翔龙院、神居院、仙居院、仁智院）、门（归义门）、殿（瑶光殿、仁智殿）、亭（琉璃亭）、观（一柱观）、阁（千步阁）、台（望景台）等。

九洲池处于宫城之内，也成为宫廷政治斗争的舞台，在九洲池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僧怀义益骄恣，太后恶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壬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14]

北宋秦再思《洛中纪异录》：“唐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拨，二曰紫叱拨，三曰青叱拨，四曰黄叱拨，五曰丁香叱拨，六曰桃花叱拨。上乃改名，曰红玉犀，曰紫玉犀，曰平山犼，曰凌云犼，曰飞香犼，曰百花犼。命图于瑶光殿。”^[15]

《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二月（905年）“是月社日，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既醉，皆绞杀之，竟不知其瘞所。”^[16]

《旧唐书·昭宗十子》：“昭宗遇弑之日，蒋玄晖于西内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为玄晖所杀，投尸九曲池。”^[17]

二 九洲池的考古概况

文献对九洲池的记述比较零碎，而九洲池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揭开了皇家园林九洲池的神秘面纱。“学术界、尤其是发掘者就任何一个古代遗址的系统研究，都是促进遗址考古发掘健康强劲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系统研究是发现问题的最好方法，田野发掘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18]对于九洲池遗址的认知，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分阶段推进而不断深入的。经过四个长时段的考古工作，经过拼合，九洲池遗址的范围逐渐清晰，时代分期也得以确定。

九洲池的考古工作始于1960年，当时通过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发现并确定了九洲池的位置及范围^[19]。在宫城西北角发现大面积的淤土堆积，西距西墙5米，北距陶光园南墙148米，淤土东西280米，南北最宽260米，总面积约为55600平方米。淤土正南有缺口向南伸出，宽约9米。通过与文献对照，“其形状大小和位置都比较相符，因此完全有可能为九洲池的遗迹。南面突出的缺口，恐是排水用的出入口。”^[2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配合洛阳玻璃厂的基本建设工程中，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全面

的钻探,确定九洲池遗址位于宫城的西北部、陶光园南250米处,东西长约205米,南北宽约130米。初步搞清了九洲池的轮廓,北部范围还不十分准确,南部因部分建筑未拆除,还未做工作。掌握了池内堆积情况,大致分为四层。其中第三层、第四层是与九洲池有关的遗迹。在九洲池已知范围内探出六座小岛,均为生土台基,岛呈椭圆形或近圆形,直径分别为23—50米,面积在1000—1400平方米之间。还探明池北面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宽约5米、深4米的渠道向北延伸,至陶光园南墙附近向内折,相交处被晚期淤土破坏,可能是九洲池的进水口。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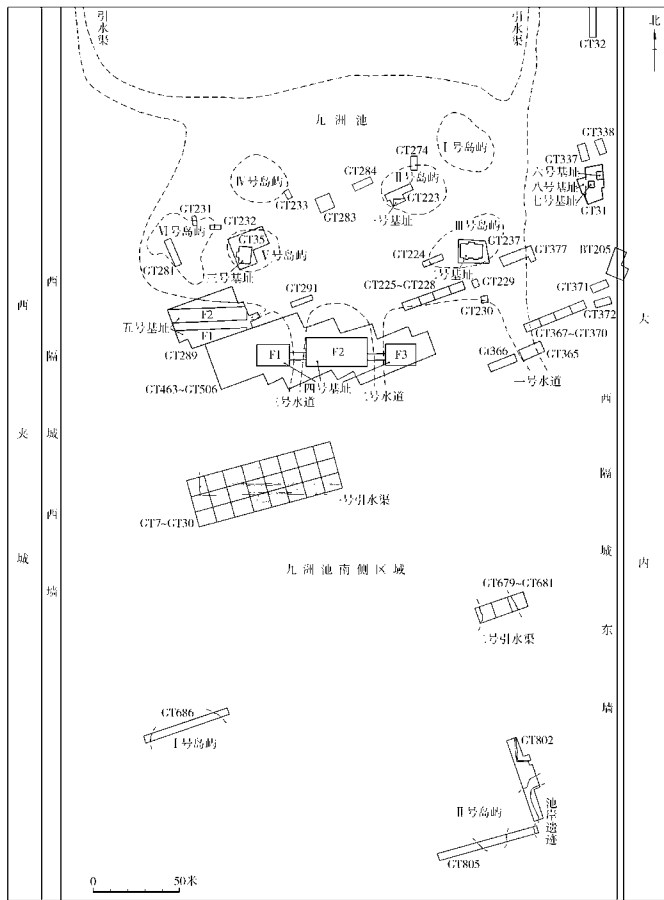
东南角也有一条渠道遗迹,可能是九洲池的出水口^[21]。九洲池考古勘探发现了六座岛屿,其中三座岛屿上发掘了建筑基址各一处,当时命名为“亭台建筑”^[22]。

九洲池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可分为隋唐和宋两个时期。其中隋唐时期的建筑遗迹有“池之洲”上的“亭台建筑”^[23]和环池建筑两大类。宋代建筑遗迹保存较差,发现礓墩建筑的千步廊和其北侧的砖砌方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九洲池遗址的认知,“虽然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尚难复原九洲池的原貌,文献记载中的一些殿堂亭院也不宜和发掘出的遗迹相比附,但就这些遗迹的分布范围,建筑规模、结构、特点来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已经可以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这是一处人工开凿的湖面,池内有多处洲岛,其上建有精巧的殿亭台阁,岛之间以虹桥相通,沿岸绿树成荫,环池建有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庭院。各个景点之间又以廊庑相连,有分有合,有机地联为一个整体。”^[24]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80年代所确认的九洲池遗址范围以南发现了大面积的淤土,在淤土周边发掘出岛屿、建筑基址及池岸护坡等遗迹^[25]。这一阶段,对于九洲池的范围有了新的认识,但不能确认这些遗迹是否属于九洲池,故在《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隋唐洛阳城》)中,以“九洲池南侧区域的发掘”为题进行叙述,并附有全新的九洲池区域图一幅(图六)^[26]。

2013年至2015年,对九洲池进行全面的发掘,发掘了北岸、东岸和西岸局部、引水



图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九洲池的范围及主要遗迹探方分布图

渠、排水渠、池中岛屿等，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纠正了80年代的一些认识，重新认识了九洲池的空间位置、范围规模、池岸结构、岛屿构成、池底结构、引水渠结构、排水渠结构等^[27]。

三 九洲池的分期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钻探和发掘，目前对九洲池的范围、规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除了南岸外，九洲池的东、西、北岸位置都已基本确定，时代分期明确，可以分早、晚两期。

早期九洲池属于隋唐时期，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形，北护岸相对平直，东西护岸呈自由的曲线形态，南岸仍未确定。其东西250、南北残长达557米，其范围包括20世纪80年代所确定的范围、90年代新发现的范围和两者之间的区域。

文献记载九洲池“居地十顷”，折合522150平方米。九洲池所在的西隔城，是四面由墙围合的区域，呈南北长方形，考古实测南北970、东西350米，面积为339500平方米。文献记载的九洲池远远大于西隔城的范围，显然文献记载有所夸大。从目前考古实测可知，九洲池面积为139250平方米，约占西隔城的五分之二，是比较合理的。

九洲池的北护岸，用长方形砖砌筑，护岸壁垂直。东、西二护岸大部分为自然的生土岸，局部用砖砌。生土护岸的迎水面呈缓坡状，个别地方发现有护岸的木柱柱洞。

九洲池范围内发现岛屿，或为生土或为淤土，岛屿平面形状各异，椭圆形或近圆形的居多，直径分别为12—50米，面积在100—1400平方米之间。九洲池池深1.5米左右，池底是天然的土底，较平，似曾做过简单的处理。

九洲池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是岛屿建筑和池岸建筑。岛屿建筑发现六组。其中20世纪80年代在Ⅱ、Ⅲ、Ⅴ号三座岛屿上发掘了建筑基址各一处，命名为“亭台建筑”。“这三座建筑规模大小虽有差别，但从基址的处理，建造技术，建筑材料等方面观察，可以确定为同一时期的建筑。再从基址地基保存较好，踏步磨损轻微，出土遗物时代单纯方面来看，这些建筑使用时间不长，毁弃后也未再建。”^[28]

在九洲池中部三座最大的岛屿上发现两组建筑群。这三座岛屿在80年代被认为是九洲池南岸，新的考古发掘最终确认是九洲池中的岛屿，东西排列，岛屿间以水道相隔。依据《隋唐洛阳城》的编号，两组建筑群为四号基址与五号基址。其中四号基址由F1、F2、F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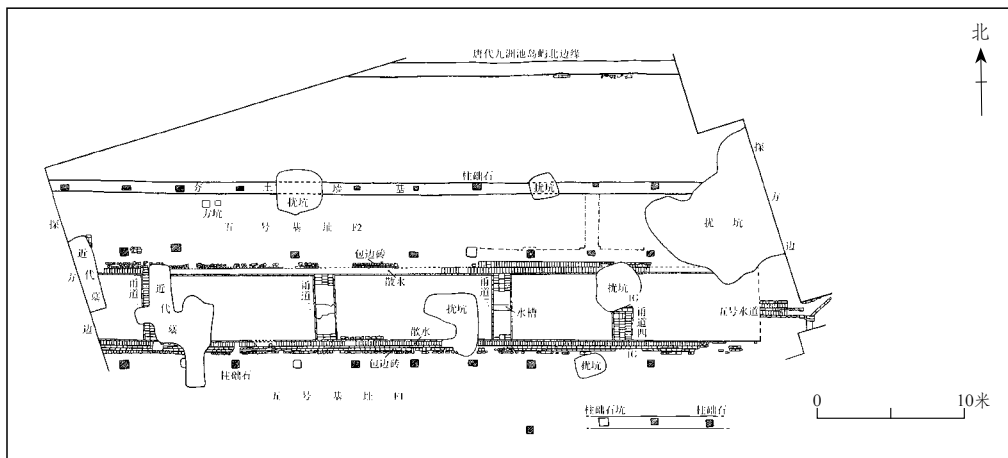
单体建筑组成，五号基址由南廊庑、北廊庑、甬道和水道组成。四号基址的F1与五号基址位于最西侧的岛屿上。四号基址的F1、F2、F3三座建筑呈东西向排列，F1、F3以中间较大的F2为中心，对称分布（图七）。三座建筑筑建方法完全相同，平面皆呈长方形，夯筑。F1基址东西长20.3、南北宽13.3米。F2基址东西长27.85、南北宽17.2米。F3基址东西长20.5、南北宽13.5米。四号基址的单体建筑之间，跨



图七 唐代九洲池四号基址全景



图八 莫高窟第321窟北壁初唐阿弥陀经变壁画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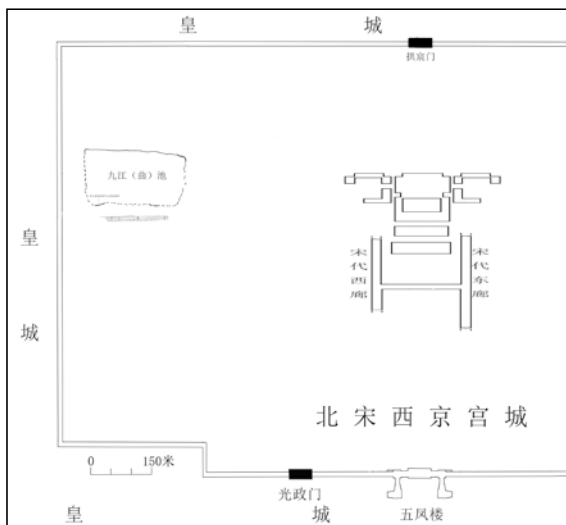


图九 唐代五号建筑基址平面图

水道以虹桥连接，在水道上发现类似桥梁建筑的遗迹，以虹桥相连的建筑群在敦煌莫高窟第321窟北壁唐代壁画中有发现（图八）。五号基址由南廊庑、北廊庑和甬道等组成。廊庑建筑呈东西向，南北两排并列，其间以砖砌甬道相连（图九）^[29]。

池岸建筑在北岸、西岸和东岸均有发现，其中北岸、西岸的建筑保存差，或仅存夯土基础，或形状不明。唯独东岸的建筑保存较好，发现三座建筑基址，编号六、七、八号基址。其中七号基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8.23、东西宽7.5米。基址的四角清理出三方柱础石和一个柱础石坑。南北间距为4.63、东西间距为5.3米。柱础石为青石，表面平整光滑。四面包边砖皆宽0.35米，未发现散水。六号位于七号的东北，基址残，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南侧有砖砌踏步，四周有包砖和散水。八号位于七号基址西侧，由夯土隔墙及其东西两侧的柱础组成。夯土隔墙呈南北向，分南、北两段，其间有一缺口，间距5米，可能为门道。

作为园林的重要组成，九洲池的水系也十分发达。水系是维持宫廷皇家园林用水和清洁水源的关键所在，地处西北隅高冈的宫城位置决定了九洲池的水系来源，城西的谷水成为宫城的唯一水源。谷水在洛阳城外分支为两道，一道东西向进入玄武城，沿玄武城南墙向东，一道沿隋唐洛阳城西城墙由北向南流入洛河。九洲池周边发现的引水渠，均来自这两道



图一〇 北宋九曲池在宫城中的位置

表明宋代九曲池比隋唐时期范围缩小。根据南侧千步廊建筑叠压在唐代的两个水道上，可确认宋代这两个水道废弃。在解剖九洲池东北隅隋唐时期的引水渠时，发现该水渠上面叠压着宋代碌墩，表明此水渠宋代已经废弃。所以，关于宋代九洲池的进排水系统仍不清楚。

四 谷水与九洲池

隋唐时期的皇家园林在规划时，就有意识地将都城供水与园林的凿池造景有机结合起来，人工开凿渠道输引自然河流的水入城中池苑内，宫苑中的池具有贮水功能，既有利于沉淀净水，净化空气，也有利于宫殿建筑防火。

洛阳盆地优越的山川形势，使之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地，沿洛河两岸分布着五大都城遗址，有“五都荟洛”的美誉。隋唐至宋的洛阳城地处盆地中部，周边水系较为发达，“左漕右润，洛水贯都”^[31]，使城市供水更为丰沛，可以很好地解决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都城供水问题，同时也满足了城内园林的用水。

谷水是洛阳盆地中重要的水系。谷水，古称涧水、涧谷水，为洛河第二大支流，发源于三门峡市陕县观音堂北马头山，向东流经澠池、义马，至新安县铁门镇入洛阳市境，再向东经磁涧后，穿过市区至瞿家屯入洛河，全长105公里，集水面积1349平方公里。其中，在洛阳市境内河长75公里，流域面积708平方公里。“谷水与洛阳的文化及城址变迁的关系也十分密切”^[32]。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下诏在汉魏洛阳故城西十八里处营建东都，宫城、皇城居于全城的西北隅，地势高亢，可俯瞰全城。此处以洛河为水源难度极大，因而只能利用谷水。“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33]。而当时采取的办法正是根据地形开凿人工渠道引谷水入城，使宫城、皇城区内渠道互通，构成以谷水为主干的水道网络。谷水从西北流来，主要流经西苑、上阳宫、宫城、皇城，最后汇入洛河。

通过人工渠道将洛阳城外的谷水分别引入宫城和上阳宫。引入上阳宫中的水渠沿洛阳城西墙南流，称为分谷渠^[34]。“考古发现隋唐时期将原东周王城东城墙4米宽的护城壕向东

渠。九洲池周边还有若干大大小小的砖砌排水渠，或明或暗，交错成网状^[30]。

晚期九洲池属于宋代。宋代九洲池仍然存在，文献记载称九曲池、九江池。根据考古遗迹可知，20世纪80年代所确定的九洲池范围正是宋代九曲池的范围。宋代以洛阳为西京，宫城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的西隔城此时已经不存在了。九曲池呈弧角近长方形，东西长250、南北宽130米(图一〇)。池南岸发现宋代步廊及道路等遗迹，叠压在早期九洲池的殿阁建筑之上，这表

扩宽至 20 米，引部分谷水南流入洛河。这一渠道与隋唐城西墙基本南北并行，是宫城西墙外的护城壕，并可能被武周时宫城西南部的上阳宫作为主要引水渠道之一。”^[35]1981 年发掘隋唐洛阳城西夹城时，在西墙外侧发现宽 13、深 2.5 米的壕沟遗迹^[36]。另一条人工渠呈东西向进入隋唐洛阳城内，在玄武城由西向东顺势而流，成为宫城内主要水源，依水建造了众多园林池沼，其中最大的就是九洲池。在玄武城内考古勘探发现两个渠道，间距 16 米。南渠紧贴玄武城南墙向东，然后拐向南北向流，穿玄武城南墙进入陶光园，渠宽 24、深 6.5 米。北渠呈东西向，西段较窄，向东逐渐加宽。底部平整，明显系人工加工。渠宽 30、深 4.2 米^[37]。

五 九洲池的园林布局

隋唐时期的宫城御苑，最大特点是广凿池，少造山。文献记载，隋唐时期，洛阳城宫城北主要是供皇帝、妃嫔、公主、皇子等居住、宴游的御园，像陶光园、九洲池等；另外，在重要宫殿前面还有一些园池小景，像徽猷殿前的石池等。陶光园位于隋唐城宫城大内之北，构成大内以北的园林区。“陶光园在徽猷、宏徽之北，东西数里，南面有长廊即宫殿之北面也。”^[38]园中有东西渠，西通于苑。园中有池，池有二洲，东洲有登春阁，其下为澄华殿；西洲有丽绮阁，其下为凝华殿。池之南有临波阁，池之北有安福门。园之东有袭芳院，并有宏徽、流杯、飞香、庄敬、文思等殿和丽春台，皆园居之建筑。徽猷殿前的石池，“东西五十步，南北四十步。池中有金华草，紫径碧叶，丹花绿实，味酸可实”^[39]。“唐代的宫城（皇城）之内不设较大规模的园池，而是在建筑物的前后或建筑物之间配以小规模园池，建回廊，筑亭台，使人漫步其间而赏泉林之胜，并由此而使建筑物的格局得到调协，以维持其风致。”^[40]

宫城御苑九洲池，其园林是以池为主，池中有岛。其规模宏大，沿用汉代以来的“一池三山”的宫苑布局，以人工渠道引水形成完整的水系，但同时运用创造性的规划方式，构成不同的园林空间。根据考古资料，其园林特色显而易见。

“广水无山”，平地筑园，以大面积的水景为主，是九洲池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根据考古实测，隋唐时期九洲池水域面积达 139250 平方米，占西隔城的五分之二。大面积的水面，可形成“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41]的效果。“大规模平地筑园，利用水源的丰富条件创造出以水景为主的新形式，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造园艺术。”^[42]

岛屿众多是九洲池的特征之一。“一池三山”是皇家宫苑营建的重要主题，表现形式为在池中堆筑三座岛屿，以表现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隋唐的宫苑建设继承这一传统，“三山”主题在两京的宫苑中都有表现。九洲池中发现多处大小不同的岛屿，显然是“岛山”主题，却并不拘泥于“三”这个数目。堆土为岛，岛上筑殿亭，是中国山水画园林风格的特征。池中岛屿的发现与文献“池中之洲”的记载相符。在其中三处岛屿上发现殿、亭类建筑，虽还不能与文献记载的瑶光殿、琉璃阁、一柱观等对应，但至少说明此类建筑在池中洲上的存在。在渤海东京城的王宫的苑池遗迹中，池中也有岛山，岛上也有楼阁建筑，显然唐代山水画风格的园林构筑范式，也影响到周边附属藩国。

九洲池创造性地营建许多别致的建筑形象，其规模、大小、建筑形式和风格有较大的差别，既有规模较大的殿阁类建筑，又有相对较小的亭类建筑，还有线性的长廊建筑。各

类建筑布局灵活，因景而设，分合有度，和谐统一。宫城御苑是为满足皇家宴饮游乐等活动而设，故九洲池御苑中建筑增多，建筑形式呈现苑中庭院的组群式布局，九洲池东岸考古发现的六、七、八号基址，已经具有围合成庭院组群的趋势。文献记载的花光院、山斋院、翔龙院、神居院、仙居院、仁智院等，多环池布置，呈现出整体性、多样性、和谐性，各类建筑巧妙地依形就势，融入周边的环境中，追求自然天成的园林意境，达到自然与人工的完美统一。

园林建筑巧妙应用“尺度设计”。尺度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规划的重要手段，采用移天缩地的营构方式，小中见大，营造出咫尺乾坤的意境。Ⅲ号岛屿上的二号基址，东西长11.4、南北宽8.58米。杨鸿勋先生确认其为小阁^[43]，“引人注目的是，如此小的殿阁正面竟用两个踏道，即南部为左、右二阶”，“这些融汇于九洲池景象中的建筑，其开间之小，仅1米多至2米多，远小于正常殿堂4米左右至5米左右的开间。同时，采用左右阶制，以表现此殿的正规，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大殿。把大殿做得如此之小，参照之下，显得空间很大。这显然是为了表现‘东海’主题，使景象产生了辽阔的效果而采取的一种拓展空间的处理。压缩景象尺度的手法表明，此时园林艺术创作已建立‘尺度设计’的概念，这在中国造园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发展。”^[44]

空间分隔与中轴对称的巧妙结合。九洲池中最大的三座岛屿，实现了九洲池的空间分隔，天然地将九洲池分为南北两部分，其间以水道将南北部分纵向连接。三座岛屿上发现四号基址，是由F1、F2、F3三座长方形殿基组成，三座殿基每座岛屿上各一座，F1、F3以F2为中心，左右对称，犹如双翼护卫，增加了九洲池的内涵。三座殿基以跨水道的虹桥形成东西向的横向连接，使九洲池中的岛屿、殿基、水面纵横相连，成为整体。

“鸟鱼翔泳，花卉罗植”，表明九洲池的生物配置范围广泛，品种极其丰富。花卉在园林中，有的是以观赏为主题，有的则是以花卉为媒介营造特别的意境和情趣。“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45]，花卉的盛开、凋谢反映着时令和天气的变化。九洲池中生物的配置，遵循自然规律，发挥生物的景观功能、生态效益，不仅满足帝王、皇子公主对园林造境艺术的追求，也能满足区域生态改善的功能要求。这种生物配置，“不仅是复杂的艺术创作，也是庞大的土木工程和绿化工程，是园林规划设计方面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全盛期的到来”^[46]。

虽然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尚难复原九洲池的原貌，文献记载中的一些殿堂亭院也不宜和发掘出的遗迹相比附，但就这些遗迹的分布范围，建筑规模、结构、特点来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已经可以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这是一处人工开凿的湖面，池内有多处洲岛，其上建有精巧的殿亭台阁，岛之间以虹桥相通，沿岸绿树成荫，环池建有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庭院。各个景点之间又以廊庑相连，有分有合，有机地联为一个整体^[47]。

对于宋代九洲池的布局特点，限于有限的考古资料，目前仅形成一些初步的认识：九洲池规模远不如隋唐，面积大大缩小。池岸继续沿用隋唐时期九洲池的北岸和东西两岸，南岸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发现过一段，位于唐代五号基址的北侧，是五号基址所在岛屿北缘的一段，宋代变成九曲池南岸的一段，与宋代千步廊建筑平行。池平面总体近长方形，池岸为自然土壁，南岸为东西向的千步长廊建筑，可能是体量较大的临池建筑。池中有岛，但数量不明，多为淤土堆积而成。池四周未发现引水和排水渠道，故其理水方式仍待探究。从池内淤土的堆积可推断，九洲池的最终废弃，是疏于管理的直接结果，九洲池最终被淤平而

导致废弃。这一切与西京洛阳不再是政治中心，宫城仅作为南郊祭祀或巩义谒陵的临时行宫别馆有关。

六 结语

汉魏时期，九洲池所在的区域存在零星的小面积水域。自公元 29 年，河南尹王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开始，汉魏时期曾多次进行与洛阳城配套的水利建设工程。引谷工程所经行的路线，即人工开渠引谷水沿着东周王城北墙向东，经千金堰后进入洛阳城。这条水渠正好从九洲池遗址北侧通过。在九洲池北部考古发现汉魏时期的零星淤土，可能就是引谷工程的渠水外泄形成的。汉河南县城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宫城之西。在汉河南县城东郊发现大量的汉代砖瓦窑址，这些砖瓦窑在九洲池下被发现，被九洲池淤土打破。根据大量砖瓦窑的分布，推断此处汉代可能是砖瓦生产区。利用引谷工程的外泄谷水，为砖瓦的生产提供必要的用水。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下诏营建东都，“九洲池是隋朝创建东都时为隋炀帝与嫔妃、宫人们嬉戏所创作的园林环境”^[48]。文献记载九洲池中的瑶光殿、琉璃阁和一柱观均为隋造，池北的望景台也是隋代所造。环池的仁智院西的千步阁，文献明确记载为隋炀帝造。

唐代以洛阳为东都，继续沿用隋代的洛阳城。在九洲池岛屿上考古发掘的三座“亭台”基址，从其规模、形制、建筑特点和建筑材料分析，均为同一时间的建筑，约在隋或唐初。

武则天时期，洛阳达到最鼎盛时期，九洲池成为武后宴饮游乐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宫廷政治斗争的舞台。天册万岁元年，骄恣不驯的薛怀义被“执之于瑶光殿树下”^[49]。九洲池中部三座岛屿上的四号基址被认为是瑶光殿^[50]，各单体筑建方法完全相同，平面皆呈长方形，夯筑而成。均呈东西向排列，为唐代一座三殿阁相连的建筑群。

晚唐至宋，文献记载九洲池称九曲池、九江池^[51]。考古发掘表明，宋代九洲池范围缩小，在其南岸有东西线型的千步廊建筑。这与文献记载宋代中晚期西京政治地位衰落，皇帝很少巡幸，西京宫城的修缮也由朝廷改为地方的情况相符。宫城御苑九曲池也难逃衰落之结局，难怪李格非在其《洛阳名园记》中感叹道：“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52]

从隋唐时期至宋代洛阳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政治中心东移，洛阳失去昔日的辉煌。作为王朝的都城在这种变革中最为敏感，无疑成为研究唐宋变革重要的标本。近年来唐宋洛阳城的考古发掘，为深化认识唐宋变革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宫城御苑的考古与研究，以管窥豹，正可见证王朝兴衰。

注释：

- [1][52] (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因版本较多，此处引(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页。本文图一据《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图5-29、图6-64，拼合改绘而成。
- [2] 王岩：《隋唐宋时期洛阳园林考古学初探》，《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 [3] 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
- [4] 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

- 《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第170页。
- [5] (唐)韦述、杜宝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 [6] 《玉海》卷一五《地理·地理书》“唐《两京新记》”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91页。
- [7]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106、198页。
- [8] 同[7]，第124、125、200页。
- [9] 同[7]，第152、203页。
- [10] 妹尾达彦：《韦述〈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1] (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35-136页。
- [12] 同[5]，第3149页。
- [13]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8页。
- [14][49]《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6502页。
- [15] 阮廷焯：《秦再思洛中纪异录辑》，载《大陆杂志》第66卷6期，1983年。
- [16] 《旧唐书》卷二〇《哀帝纪》，第790页。
- [17] 《旧唐书》卷一七五《昭宗十子》，第4546页。
- [18] 杜金鹏：《二里头遗址研究·前言》，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 [19][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 [21][22][23][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
- [24][47] 王岩：《隋唐宋时期洛阳园林考古学初探》，《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15页。
- [26] 同[25]，第767页，图6-64。
- [27] a.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3-334页；b.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2页。
- [29] 图七、图九，分别采自《隋唐洛阳城》图版230-1、图6-70(改绘)；图八采自敦煌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版55。
- [30] 同[27]；图一〇，底图采自韩建华《试论北宋西京官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图一(《考古》2016年第11期)，改绘而成。
- [31]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982页。
- [32] [35] 王炬：《谷水与洛阳诸城址关系初探》，《考古》2011年第10期。
- [33]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86页。
- [34] 同[7]，第142页。
- [3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 [37] 同[25]，第882页。
- [38] 同[7]，第122页。
- [39] 同[7]，第121页。
- [40] [日]冈大路著、常瀛生译《中国官苑园林史考》，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 [41] (明)计成撰、陈植注释、杨超伯校订《园冶注释·园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 [42] 张家骥：《中国造园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8页。
- [43]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513页。
- [44] 同[43]，第514页。
- [45] (宋)陆游撰、钱仲联校注《村居书喜》，《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02页。
- [46]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 [48] 同[43]，第511页。
- [50] 同[27]b。
- [51] 同[7]，第152页。

(责任编辑 霍宏伟)